

日治最初期台灣福佬話教材編纂之相關考察： 日本人對台灣福佬話的認知與概念

市川春樹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博士生

haruki0728@hotmail.co.jp

摘 要

1895 年（明治 28 年）4 月清國依照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予日本。當時，登陸澎湖群島及台灣島的日本軍翻譯官無法以官話（Mandarin）溝通，因此即時製作日語和台灣福佬話的對譯教材。爲了與當地人溝通，當年 6 月至 12 月之間陸續出版《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臺灣言語集》、《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臺灣會話編》、《臺灣土語》、《臺灣語》等簡便的教材。

本論文旨欲探討日人第一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如何習得對方語言並且進行溝通，這個問題至目前爲止仍尙待釐清。雖然幾項先行研究中，已對此議題提出初步的答案，包括筆談或使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及短句，且編纂對譯教材。然而，在筆者調查的教材中，仍然存在不符前述假設的情形。例如《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裡，都發現有不使用媒介語言記錄台灣福佬話的案例。

由此，本論文欲以維高斯基（Vygotsky）的語言習得、發展理論做爲對照，探討人類在社會中獲得語言的方式，再者，如何從「外言」獲得「內言」，「內言」再連結到思考。這個觀點儘管是講述習得第一語言時的過程，卻暗示社會、語言的差異，如何影響到思考的過程。因此在分析最初期教材中的誤用時，甚有裨益。本文透過分析當初日人蒐集辭彙的方式、對譯、假名表記的方式，對照教材製作者的背景加以探討，並討論先行研究之成果，以期能逐步釐清日人首次接觸台灣福佬話時的相關認知。

關鍵字：台語教材、台語教育、台語假名、台灣福佬話、認知概念

1. 序論

首先介紹本文援用的雷夫·沙彌諾維奇·維高斯基（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Lev Semenovich Vygotsky）所提倡的心理語言學理論，如何適用於本文的研究分析對象，以及所可能達到的成果，進一步論述本理論援用之必然性。

1.1 外國語習得與維高斯基（Vygotsky）理論

人們時常說「（不）會說外國語」，「（不）精通外國語」，並對這句話毫無疑惑。但如何解釋「（不）會說外國語」，「（不）精通外國語」卻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為此，我們可運用維高斯基的理論來分析。該理論主要適用於兒童習得第一語言，或習得第二語言（外國語）的過程，因而可做為基礎理論和對於外國語習得的理論參考。該理論儘管偏向心理學上的分析，但適合於分析在語言使用上發生的思考與理解。一般語言學只以語言的語法結構、發音、聲韻、語意、語用等為分析對象。這些是維高斯基所說的「外言」的邊緣，並非將腦海裡的語言活動可視化（visualization）。反之，維高斯基所用的「外言」、「內言」¹概念，可說對分析不可視（invisible）的語言活動時最恰當的理論模式。特別是概念形成的實驗，對於解釋在沒有媒介語言狀況之下，試圖理解未知語言，所發生的思考過程時，具有相當程度的幫助。即以釐清在概念形成之過程的語言使用上擔當的功能與其性質為目標，實驗者做出發生形成概念的環境，並觀察分析其過程。在這裡不提詳細的實驗內容，²只簡單地論述其重點。在第一階段，實驗者賦予被驗者意義不明白的詞語。事實上那個詞本身具有某種意義、概念，在此之重點是被驗者在實驗中如何發現其意義、概念。隨著實驗的進行，被驗者漸漸明白原先意義不明白的詞語在表達甚麼意義。也就是，此時被驗者形成新概念，實驗者從被驗者的反應以及解答模式來推演概念形成的過程以及其階段。如此，維高斯基提到的從思考到發話過程的理論，將可說明人們發話前腦海裡所進行的語言活動。

以下簡單地介紹該理論中人的發話結構，與第二語言習得。維高斯基認為自思考至發話的過程如下：

發生思考的動機 ⇒ 內言 ⇒ 話語的意思 ⇒ 話語本身（外言）

¹ 外言以及內言表示人的發話階段。內言不伴隨聲音且內面化，可說為思考所使用的工具。結構以謂語為中心，比外言壓縮、省略較多，單字之間的結合並非齊備文法。一方面，外言伴隨聲音，是所謂的聲音語言，為傳達所使用的社會語言。構造以主詞為中心，文法上具有整合性。

² 詳細實驗請參考《思考と言語》〈第五章 概念の発達の實驗的研究〉。

第一語言，一聽到話語本身（外言）就了解對方講的意思，即使該發話非常不完整，我們亦能理解第一語言的「發話」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一接收到對方的話語馬上就理解「話語的意思」，或想像到「發生思考的動機」。雖然上述的模型是第一語言的，但第二語言習得亦適用。據維高斯基說：「兒童的第二語言習得的過程會與第一語言正好相反」（レフ・ヴィゴツキー著、柴田義松譯，1962：下 114）。回到開頭提到的問題，「精通外國語」與掌握對方（外國人）在說話時的聲音語言、話語的意思、發生思考的動機關係密切。

回到本論文主題，日治最初期之時，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的溝通面臨甚麼樣的問題？其又如何記錄台灣福佬話？是本文意欲釐清的關鍵所在。是故，以下將探討這些問題。又根據維高斯基所言：「學習第二語言時，不僅與第一語言相反，書寫語言較優越，掌握音韻、語法卻落後。」（レフ・ヴィゴツキー著、柴田義松譯，1962：下 114）在已富有語言教材而確立學習法的語言³，尤其會看到這種現象，反之，當時日本皆無台灣福佬話教材，台灣福佬話對日本人而言是一種近乎未知的語言。然而卻又並不像亞瑪遜河流域深處的原住民，與文明世界的探險隊接觸時的那般陌生。維高斯基在《思考與語言》（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中，曾指出為了與人溝通，不可欠缺「普遍化」和「辭義認知的發達」，維高斯基的分析中也舉幼兒的例子，講述其不能「普遍化」且不夠「辭義認知的發達」，所以不能傳達的事情不少。並且，維高斯基套用托爾斯泰（Tolstoi）的想法說：「不是不能理解話語本身，而是不能理解該語言所表達的概念。」（レフ・ヴィゴツキー著、柴田義松譯，1962：下 11-15）。可說話語的意思，不只含思考與語言的統一，而且含一般化與溝通的統一。語言溝通相關的問題如此整理，然而不得認定台日語言之間毫無互相溝通的方法。由於台灣漢人、日本人使用漢字的歷史悠久，因此當時就算識字率非常低也能使用漢字溝通。有關這些，在日治初期台灣福佬話教材的先行研究⁴中就曾指出：

（1）以聲音媒介語言（官話）進行編輯

（2）以書寫媒介語言（^{かんぶん}漢文、文言文）進行編輯

然而，筆者調查 1895 年（明治 28 年）6 月至同年 12 月之間發行的台灣福佬話教材共 8 本，其中 6 本符合（1）、（2）的條件，但兩本卻不符合「日治最初期福佬話教材用媒介語言製造」這個通說。以下舉先行研究之例：

³ 如英、法、西班牙語等普及於全球的語言便是。

⁴ 除了最初期台灣福佬話教材相關研究之外，伊澤修二與芝山巖學堂等日語教育研究也提到最初期台日之間語言溝通的問題。

吳守禮（1955）引用國府種武撰〈日本教授之實際〉，提出最初期日本人方面依靠通曉北京官話的吉島俊明等人，台灣人方面，則有能辨官話的朱俊英等人溝通，總結說：「是為台日雙方初期接觸時之情形，但迫於彼此軍民眼前之需，促成了無數小型會話書之出現」，⁵另外，篠原正巳（1999）更詳述有關通譯之事。第一點：遽派到台灣的通譯，是近衛師團北京官話通譯，伊澤修二沒伴隨官話通譯。第二點：學務部獨自僱用通曉英語，或者文言文（漢文）的通譯。根據篠原正巳（1999：12-13）的記載：

學務部では通訳として吧連徳・林瑞庭の2名を採用した。吧は清国人で香港の高等学校を卒業し英語に通じていた。英語を介して伊澤の通訳を務めた。林は台湾人であるが漢学の素養のある知識人であった。

[學務部僱用吧連徳、林瑞庭兩人為通譯。吧是清國人，在香港高等學校畢業，由此通曉英語。發揮英語能力，而擔任伊澤的通譯。林是台灣人，且具備漢學素養的知識分子。]

此外，樋口（2012）、富田（1998）亦示官話通譯的存在。

這些先行研究闡明不論是聲音語言（官話、英語），或是書寫語言（文言文），都存在媒介語言，卻沒有提出其他的可能性。筆者透過《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兩本的分析，提出聽取目標語言後，以類推而從陌生的單字或短句，獲得內外言、理解語意跟自己的母語，形成得以連結的模式。以金田一京助遇到的情況為例，聽話者聽取某個單字，聽話者模倣而向說話者講出，以及藉由視覺資訊，再以說話者的反應等開始類推語意，最後反覆之，以獲得內外言。若得疑問詞，則發展成簡單的問答。⁶當然使用這方法可收集的詞彙，偏向單獨的具象名詞或動詞，以及色彩形容詞。

筆者將在下一節介紹這些教材後，進入討論。

1.2 日治最初期之台灣福佬話教材

在 1895 年 4 月 17 日馬關條約締結之前，同年 2 月 26 日陸軍比志島混成支隊先佔領澎湖群島，6 月 2 日近衛師團於台灣本島三貂角登陸，並與台灣民主國軍隊爆發衝突。11 月 18 日第一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宣佈平定全島，然而以黃虎旗為主的抗爭行動，卻持續到了翌年 2 月。這段時期已經出現了幾本台灣福佬話的教材，最早的編纂於 1895

⁵ 吳守禮（1955：1）也敘述日治最初期的台日之間的語言溝通。

⁶ 此時，金田一京助為了得到疑問詞，故意畫莫名其妙的圖畫給兒童們看。

年 6 月到 12 月間，並陸續發行這些未受到教會羅馬字（POJ）影響的教材，而這些都是經由日本人的各種試驗編纂而成，十分值得分析。

除了 1895 年度編的幾本教材，還有伊澤修二⁷會見巴克禮兩個月之後，於 1895 年 12 月 17 日脫稿的《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1895 年 12 月刊行），以及台灣總督府民政部學務課編的《新日本語言集甲號》（1896 年 2 月刊行）。這兩部教材，皆經由台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長伊澤修二進行編纂。他於 1895 年 10 月，隨初任總督樺山資紀巡台視察途經台南府時，因拜訪長年居台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托馬斯·巴克禮（Thomas Barclay），而深知台灣語言現況，從而得知教會羅馬字資料的存在。於是受到教會羅馬字的影響，創造了所謂的台語假名（臺灣語カナ），亦獲得政府機關及人民長期的使用，直到日本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為止。⁸接觸到教會羅馬字以後，日本人對台灣福佬話的理解與體系化更為快速。換言之，可說伊澤修二參考教會羅馬字製作台語假名之前，日本人對台灣福佬話的聲音語言皆無體系化的知識。⁹

上述 1895 年 6 月至 12 月發行之最初期的台灣福佬話教材，目前筆者確認的共有 8 本。¹⁰當時關於介紹台灣的書籍陸續發行，亦包含介紹台灣語言的書籍，但令人可疑的部分不少，以《地理風俗臺灣事情》（天野馨，1895）這部書籍來說，雖有介紹台灣語言現況的部分，但很難反映當時的台灣語言的情況。根據樋口（2012），該書記錄「通語」78 個字，「蕃語」28 個字，所有的「通語」都是官話，再者，天野以下的一番話，「臺灣語學は生蕃と熟蕃が居住する商業地とは全く用語を異にして商業地には多く支那人の居住する事なれば支那語を研究したる者たらんには多くは差支へなし然らざれば内地人にして若し渡臺せし場合には即ち筆談に若くはなし」（天野馨（寒英）編，1895：51）（台灣話不同於生蕃與熟蕃居住的商業地用語。因在其商業地居住許多支那人，而修習過支那語的人士都能溝通無礙。不然，若是在內地人渡台的場合中，不如以筆談為佳），則可看出天野馨欠缺對於台灣本地的語言現況的知識。以下筆者將捨棄這種非台灣福佬話、份量不夠或是不甚客觀的資料，限定以語言教材價值較高的資料，進行分析與考察，並列舉各台灣福佬話相關教材書籍與特色，再加以說明：

⁷ 關於伊澤修二出版的教材，請參照黃幸素（2007）。

⁸ 根據賴欣宜（2011），1944 年出版的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編《臺灣語教科書》（改訂十一版）為日治時代最後一本福佬話教材。

⁹ 林美秀（2009）提出《臺灣十五音及字母表 附八聲符號》為台語假名的草創，將台語假名發展歷史分成草創期（1895-1901）、定著期（1901-1932）、成熟期（1932-1945）。

¹⁰ 《臺灣言語集》與《臺灣地誌畧・臺灣言語集》版權頁上的負責人、出版社皆同。後者加地理書。發行者為中村芳松、發賣所為中村鍾美堂。《臺灣地誌畧・臺灣言語集》可視為《臺灣言語集》的增補。在本文視為兩本書。

(1)《新領地臺灣島》：素堂學人著、瀧川三代太郎編，為解說台灣地理、社會、文化的書籍。1895 年 6 月發行，序文上看到「明治乙未の夏凱旋軍隊販京の日」，根據這一句，6 月才脫稿。其中在〈風俗及び言語篇〉提及台灣福佬話：

臺南臺北の言語は首として廈門漳州泉州等の如き福建省南部の土音に廣東省汕頭等の土音を混和したるものに係る故に廈門の土語に通ずれば開港場附近の地方に在りては毫も不自由を感じることなし嘗に廈門に在る英國宣教師ドクトルマガオニ氏¹¹の言ふ所を聞くに廈門の土語は廣く福建省南部の各地と臺灣南北の兩部に通じ今日廈門語を用ふるの人口實に七百萬の多きに至ると云へりされば我が國人にして臺灣新領地に至り貿易を営み事業を起さんと欲するものは最先に廈門の土語に通ずること最も必要たるべし今此等の人士の爲め最も淺近なる臺灣の土語無慮一千餘言を撰み左に掲記し以て土語の速成入門の一助に供せんとす若し或は土語を學ぶの暇あらずして勿忙彼の地に至るの人士は土人に接するに際し此記に就て必要の言語を拾は、蓋し決して燕喃蛙鳴の類に非ざるべし。(素人學堂著、瀧川三代太郎編，1895：114-115)

[故台南、台北の語言主要混淆廈門、漳州、泉州等，福建省南部土音與廣東省汕頭等土音，而通曉廈門土音，則在開港地附近地區並無不便。嘗聽到逗留廈門的傳教士麥嘉湖博士所說，廈門土音於福建省南部各地和台灣南北兩地區廣泛地通用，今日用廈門語之人口多於七百萬。因此我國人至新領土台灣欲做貿易或起事業者，最先必要通曉廈門土語。在此為這些人士撰最常用的台灣土語一千多個詞，且如左記。以供於土語速成、入門。若無暇學土語，勿忙至彼地之人士，當接觸土人之際，就此記以拾所需之詞彙，蓋非燕喃蛙鳴之類。]

由此可看出，是透過在廈門的英國傳教士而得到台灣的相關資訊，以及掌握正確的台灣語言現況。但所揭的〈日用臺灣土語〉則是採用澎湖的腔調。

(2)《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1895 年 7 月發行（5 月完稿）。著者侯野保和是隸屬比志島義輝大佐（1847-1927）的通譯官，序文上看到「在澎湖島比志島混成枝隊司令部」。

¹¹ 屬倫敦宣道會的麥嘉湖（John Macgowan）傳教士。

(3)《臺灣言語集》：1895 年 8 月發行（5 月完稿），著者岩永六一，也和侯野保和同樣，是比志島混成支隊司令部的通譯官，版權頁上看到「在臺灣混成支隊司令部附通譯官」，序文上寫著「澎湖島媽宮城通譯官房にて勇しき軍歌を聞きつゝ」（聽著勇壯的軍歌 於澎湖島媽宮城通譯官房），應該是侯野保和的同事。內容亦是以會話問答和動詞、形容詞為主，與《臺灣日用土語集》大同小異。

(4)《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速記者加藤由太郎著，1895 年 9 月出版，序文中有「七月歸朝の夜」之字，與《新領地臺灣島》一樣是由民間人士編纂的書籍。而後到台灣北部時，改為記錄泉州系統的台灣福佬話。

關於速記者加藤由太郎的生歿年記載，日本速記協會亦無記錄，但是，從他所速記且翻譯的出版物而看，僅闡明明治初期生於東京，¹²大正後期逝世。另外，出版講談之際，往往寄序文，文末所寫的地點都是東京，¹³因此將其居住地擬定為東京下町地區。

加藤由太郎原是「落語、講談」¹⁴等口述藝術的速記者。¹⁵根據統計，加藤由太郎在業績速記與翻譯的數量上，自 1893 年（明治 26 年）起，至大正年間後葉這段期間來看，有明顯增加的局勢。從 1896 年（明治 29 年）以後到 1919 年（大正 8 年），24 年之久數量且達到 143 篇，而講談與落語也相繼問世。其業績特別集中於從台灣回國後，1896 年到 1908 年（明治 41 年）之間。與其相反的，1893 年到 1895 年數量極少，僅僅有 8 篇。因此，加藤由太郎渡台的目的，可能是為了提升身為速記者的知名度。另外，關於他逗留台灣的期間，推測如下：序文中敘述「予媾和となるや爰に意をそゝぎ軀驅マの虚弱を顧づ倉卒彼地に至り炎熱が如きを忍び虎病の遽烈を避け東奔西走して土人と交りを結び漸く日常用ゆべき語を筆記して歸朝せり。」（清日媾和後，我儘管身體虛弱卻連忙決定前往台灣，忍耐炎熱，避霍亂蔓延，東奔西走，而與土人結交，在逐一記錄了日常用語後，才返國。）另外，序文末有記「菊月七月マ歸朝の夜」。根據這個記述，加藤由太郎在台灣的期間，自 4 月下旬至 7 月僅有三、四個月。如果是「菊月七日」的錯字，便是 1895 年 10 月 24 日（農曆 9 月 7 日），但此書版權頁上的出版日是 9 月 19 日，擬定陽曆 9 月 7 日才穩當。無論如何，他爾後既沒有在台灣求官職，也沒有再編纂語言教材。《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是他編的唯一語言教材。

¹² 市川春樹（2010）曾指出，《案内》裡的日文被認為是受到東京方言的影響。

¹³ 例如，講談《明智日向守光秀》之速記者序文有言：「東京江東の場すへ 日吉堂主人に代つて 加藤みづ 志留春」（於東京江東關廟 替日吉堂店東述序 加藤蚯蚓記之）。

¹⁴ 「落語」是一個人演的話劇，相近中國的單口相聲。「講談」雖然類似落語，但題材是較長的軍紀物、政談等，如有註釋的朗讀。明治時代盛行出版速記落語、講談的「講談本」。

¹⁵ 他的速記資料有邑井一所演出的《日本三勇士》，放牛舍桃林所演出的《水戸尾州紀州三家三勇士傳》等。

(5)《臺灣會話編》：坂井釵五郎著，1895 年 9 月發行，序文識 8 月下旬，近衛參謀長鮫島重雄(1849-1928)工兵大佐題辭，佐本壽人(生歿年不詳)近衛步兵少左序文，在新竹陣營完稿。記錄的竟然是同安腔，筆者推測坂井抵新竹前已有草稿，在新竹時完稿。著者可能是「近衛師團司令部附」官話、朝鮮語通譯官，據佐本壽人寫的序文說：「曩朝鮮語亦能北清之語解焉嗚呼天稟豪邁沈毅之性砲烟彈雨之間是書著述引證衆書而一音一義之悉可採」。

(6)《臺灣地誌畧・臺灣言語集》：1895 年 9 月出版，岩永六一著、後藤常太郎編。前半部解說台灣地理，後半的語言部份即是上述的《臺灣言語集》。

(7)《臺灣土語》：佐野直記著，1895 年 11 月 3 日由大阪共同商會活版部(臺北府北門街一丁目十八番戶)出版。緒言末尾記「明治二十八年九月臺南民政支部通譯官編纂」，卷末亦記「明治二十八年十月上旬基隆ニ於テ 臺南民政支部藏本」。根據緒言，可知與秀才陳洛書這個人物合著而完成。本書是第一本附有聲韻相關資訊的教材。先提對於入聲和鼻音要特別注意，以在右下邊的○與△來表示，有關入聲同於韻書標示四聲的方式。另外，亦附有說明斷音和續音兩者之別。「斷音ト續音トノ區別ヲナサシガ爲○ヲ用ヒ或ハ又タ●ヲ用ユ喉○あう頭○たう刀●とを車●ちや一轎●きをう等ノ如シ(車●ちや一ハチヤノ間短ク續ク)(頭○たうハタ、ウ、ノ間斷ヲ發音ス)。日人了解台灣福佬話裡的入聲韻尾，和鼻化元音概念，加之依韻母的特徵分別斷音和續音，這一點十分有特色。但佐野直記用的斷音、續音並不是依據傳統聲韻學的韻母分析，而是依據日文的拍(mora)概念，來分析福佬話韻母，因此有時將同一個韻母分成○和●。

(8)《臺灣語》：田內八百久萬著，1895 年 12 月發行(11 月完稿)，從參謀本部編纂課長陸軍步兵大佐福島安正(1852-1919)贈題辭來看，田內八百久萬可能是屬於帝國陸軍第一軍的軍人。記錄的是漳州系腔調。

以上介紹 1895 年所出版的教材，但本文不論及 1896 年(明治 29 年)以後出版的《新日本語言集》甲號、《日臺會話大全》、《獨習自在臺灣語全集》、《臺灣會話編》¹⁶、《警務必携臺灣散語集》，以及《臺灣土語》¹⁷等教材，這是因為筆者以 1895 年作為台灣福佬話教材史上的一個劃分，翌年 1896 年以後，則為另一個劃分。筆者清楚界定 1895 年的原因，是因該年之教材，包括田內八百久萬的《臺灣語》¹⁸之著者，是在欠缺對台灣福佬話的知識的狀況下編寫，欠缺聲韻、詞彙、文法的記述，因此不得不看應付一時

¹⁶ 與坂井釵五郎《臺灣會話編》(1895)不同本。

¹⁷ 與佐野直記《臺灣土語》(1895)不同本。

¹⁸ 吳守禮(1955)已提出「惜昔細查內容，知其大致實將馬約翰之『英華口才集』前半部改頭換面而成者」。

的教材。與其相反，《新日本語言集》甲號以後的教材，聲調符號齊備，表記相較固定，台日之間的對照、對譯等方面，也有顯著的發展。

顯然 1895 年 10 月，伊澤修二會見巴克禮時，得到有關台灣福佬話相關資料¹⁹，並據以創造台語假名（臺灣語カナ）以後，尤其在表記法方面，變化更為明顯。由此可見，研究西方傳教士的資料，以及創造台語假名（臺灣語カナ），對 1896 年以後的教材而言，甚為重要。另外一點，日本統治台灣後，經過一段時間，台灣人、日本人雙方互相習得日語和台灣福佬話，這也可有助於台灣福佬話教材之編纂。篠原正巳提出以伊澤修二為首，日本人第一次開始學台灣福佬話的情況（篠原正巳，1999：13-18），這是站在日本人立場的「語言學習者」。伊澤修二他們是日語教師，同時也是台灣福佬話的學習者。而與之正好相反的，柯德三先生於其傳記《母国は日本、祖国は台湾—或る日本語族台湾人の告白—》一書中，提及他祖父柯秋潔第一次接觸到日語而開始學習時的故事（柯德三，2005：41）。柯秋潔是芝山巖學堂第一屆學生，後來跟伊澤修二共同向日本人教授台灣福佬話。柯秋潔是台灣福佬話教師，同時也是日語學習者，即是站在台灣人立場的「語言學習者」。

筆者再將 1895 年當年的教材分成二類，《新領地臺灣島》（以下簡稱為《臺灣》）、《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內》（以下簡稱為《案內》）與其他到年底出版的教材。這些教材中間存有差別，分析如下：

（1）是否認得音節概念。

《臺灣》、《案內》不分音節而連寫，甚至在片語、短句連單字都不分。其他教材均將音節分開記述。

（2）《臺灣》、《案內》收有片語、短句偏少。

《臺灣》短句 0 例，片語 8 例。《案內》短句 48 例，片語 1 例。其他教材佔將近一半的分量。

（3）《臺灣》、《案內》兩書著者可能並非軍內的官話通譯，將於下文討論。

¹⁹ 即是麥嘉湖著《廈英辭典》、《英華口才集》。

2. 《新領地臺灣島》〈日用臺灣土語〉與《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內》分析

在 1.2 介紹的教材中，《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言集》、《臺灣會話編》、《臺灣語》這四本教材，皆是由陸軍通譯官編纂，因此語法、辭彙可看到官話的影響，除此之外，還有如：「你會講紅毛話賣 ニーオイコンアンモンオイモイ 汝ハ英語ヲお話シデスカ」(岩永六一，1895：62)等，而為何上述例句中，會看到以認得的媒介語溝通的痕跡，就是因為這些書的著者是精通官話或英語的通譯官，因此會用媒介語言收集台灣福佬話辭彙和短句。至於《臺灣》、《案內》兩本雖然是由民間人士編纂而並沒有軍事色彩，且著者素堂學人與加藤由太郎他們至少已知不精通官話、英語，但可推測具有些許漢文(文言文)能力。²⁰因此可知有用筆談收集辭彙的可能性，然而也看到，若單只用筆談，卻會出現不可有的謬誤。因此從這兩本資料看得出，當時的台灣福佬話與日語的關係不是完全未曾交集的語言，雖說不完整，卻皆使用漢字，並且用直接聽寫的方式加以記錄。再者台日之間的接觸，也從僅僅有共通的文字(同文)，開始面臨未知聲音語言的狀況。

「同文」之問題以巨視點來看，台灣與日本可說是共有文言文(漢文)的「同文」地區。在本文中，提到加藤由太郎的漢文能力，其速記的「講談、落語」作品，以及《案內》裡的日語書寫，如實際的例子來看，至少沒有與台灣知識分子自在溝通的文言文(漢文)能力。《案內》自序中的「東奔西走して土人と交りを結び漸く日常用ゆべき語を筆記して歸朝せり」(東奔西走而與土人結交，逐一記錄日常用語，爾後回國來了)這一句，也旁證其不具備媒介語言(英語、官話、文言文)，值得參考。另外，還有文言文(漢文)與筆談的問題，筆談通常指所有使用文字的對話，當然含括使用文言文(漢文)的場合。然而在本文中，分為使用文言文(漢文)將所有的事物文字化傳達之場合，以及用漢字表記自己母語的單字、短句之場合。由於使用前者，難以發生從類推獲得內外言的過程，因此將後者稱為「筆談」，再者本文定義的「筆談」並非共通語言，反而接近象形圖或圖畫的功能，且將探討重點置於：(1) 可不使用筆談的場合，(2) 筆談時無法溝通或發生齟齬的場合。分析《臺灣》、《案內》之際，首先留意這「同文」關係的問題。以表語文字漢字來成立統治者、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是世界殖民地統治史上的特例。這意味著須得區分使用筆談的場合和不使用筆談的場合。以下從上述兩種資料同時發現使用筆談的證據與不使用筆談的證據。

²⁰ 至少具有讀寫日文漢字的能力。

2.1 《新領地臺灣島》〈風俗及び語言篇〉、〈日用臺灣土語〉

素堂學人於書中寫著：「今人士の爲め最も淺近なる臺灣の土語無慮一千餘言を撰み左に掲記し以て土語の速成入門の一助に供せんとす」²¹（在此爲這些人士撰最常用的台灣土語一千多個詞，且如左記。以供於土語速成、入門）（素堂學人著、瀧川三代太郎編，1895：115）。《新領地臺灣島》以收集辭彙名詞爲主，除了名詞，只含 70 個動詞、形容詞、指示詞、疑問詞、短句。上書日語漢字，下以カナ（假名）記錄台灣福佬話且無漢字表記。收納的單字大概有如下的特色：

I. 以漢字筆談得到的單字

II. 中介現實的物體、概念類推的單字

III. 試圖以聲音語言溝通的過程中，類推得到的單字（從狀況推測日語的意思）

以筆談收集到的單字如下：

(1)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星	シヨーン	sing
	雨	ウー	ú
	雨衣	ウイー	ú-i
	流水	リウツイ	liû-tsuí
	林	リム	lîm
	從兄弟	チ° ヨンヒヤンテ° ー	tsiông hiann-tī
	從姊妹	チ° ヨンチーバー	tsiông tsí-bē
	混成枝隊	フウーンセンチ° ート° ーイ	hūn-sîng tsi-tuī
	通事	ト° ンス° ー	thong-sū
	通譯官	ト° ンエ° コワーン	thong-ik-kuann
	行く	キヤーン	kiânn
	柔	ロアンジョク	luán-jiòk
	煤	モーイ	muê

透過筆談得到的單字，通常用白話文的單字卻以文言音記錄，明確但不自然的表現，應是將日語漢字直接用台灣福佬話漢字音念出來所呈現的結果，其他應也有透過筆談得到的單字，但確實的例子僅只有上述之例。這些雖是藉由漢字的媒介得到的字，但

²¹ 可視爲〈日用臺灣土語〉之簡介。

因爲筆談也可視爲溝通方式之一，因此該文獻中語言之間的問題，還有待思考。

(2)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日語辭義
	林	リム	lîm	樹林、林仔
	行く	キヤーン	kiânn	去
	柔	ロアンジヨク	luán-jiók	軟或有
	煤	モーイ	muê	煙黹、黹埃

上述的例子(2)，是說明在思考動機發生到話語本身(該場合以文字化表現)時，以及在聽話者類推說話者話語的意義，及思考的發生過程中，發生謬誤。以下圖示聽話者與說話者之間的對答。

(2)'	說話者	→ 文字化(≡發話)	→ 聽話者
	ハヤシ(樹木の集合體)	→ 林	→ リム(台灣的姓)
	ユク(人往某地方去)	→ 行く	→ キヤーン(人動兩隻腳慢慢地往前行進)
	ヤハラカシ(物體軟或有)	→ 柔	→ ロアンジヨク(體質虛弱沒力氣，個性柔弱畏怯)

其他的將日語直接用台灣福佬話念出來的例子，筆者推測是聽話者誤會說話者要求文言音，或不能類推所見日語漢字的意思。

接下來探討中介現實的物體、概念類推的單字。這些例子，意義上有重複的部分，福佬話和日語之間卻有齟齬。下面舉個例子：

(3)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月	ゴワッホー	guát-kong	【月光】 ²²
	手ぶらし	ケクイモチエーン	kue-môo-tshíng	【鷄毛筯】
	紐	ニウパン	liú-phàn	【紐襻】
	刷毛	オイメン	uê-bín	【鞋刷】
	薪	パーツアイ	phuà-tshâi	【破柴】

²² 本文以便與日語漢字區隔，對福佬話漢字表記均用【】表示。

菓子	ヅヤイ	tshài	【菜】
下痢	スサーイ	sái	【屎】
これら病	ラウサーイ	làu-sái	【落屎】
瓦工	トーツイサイフー	thôo-tsuí-sai-hū	【塗水師父】
臥	クーン	khùn	【睏】
罪人	ホワーンラン	huān-lâng	【犯人】
儒者	タクスーラン	thák-tsu-lâng	【讀書人】
陸	ロロー	liók-lōo	【陸路】
野戰郵便局	シンキヨク	sìn-kiók	【信局】
公園	ホーイフヌン	hue-hng	【花園】
ごまめ	パーラン	pa-lang	【巴郎】
鉢	ルイコワー	luí-puat	【搗鉢】
手本	リャンシヂ	liān-sip jī	【練習字】
金巾	イウンボー	iù-pòo	【幼布】
汗拭	アームクン	ām-kún	【頷頸】
胸	シムコワー	sim-kuann	【心肝】
腕	ヘンケー	hing-khám	【胸坎】
出産	ヨーンピヤン	iúnn-pīnn	【養病】

這些單字恐怕是不使用筆談，而是從實物或場面類推的例子。可以說這些例子是到達發生思考的動機→內言→話語的意義→外言的過程，及聽話者類推這些過程時，所發生的典型的齟齬。

(3) a.	刷毛	オイメン	uê-bín	【鞋剋】
	薪	パーツアイ	phuà-tshâi	【破柴】
	菓子	ヅヤイ	tshài	【菜】
	罪人	ホワーンラン	huān-lâng	【犯人】
	儒者	タクスーラン	thák-tsu-lâng	【讀書人】
	臥	クーン	khùn	【睏】

上述之例是因定義範圍的不同引起的不合，而本來的語意愈抽象類推愈困難。譬如說：

(3) b.	下痢	スサーイ	sái	【屎】
	これら病	ラウサーイ	àu-sái	【落屎】
	瓦工	トーツイサイフー	thôo-tsui-sai-hū	【塗水師父】
	公園	ホーイフヌン	hue-hng	【花園】 ²³

這些例子從狀況想像對應的日語，都是疾病名、職業、設施名等較為抽象的單字。

像Ⅱ類一樣，直接看到實物類推語意的例子之外，還有上述的Ⅲ類，在試圖溝通的過程中得到的單字。如果概念比較抽象且複雜的話，無法看實物類推語意，只能看使用該單字的狀況而判斷。在《臺灣》裡，確定分成Ⅲ類的例子不多，只舉以下3例。

(4)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氣絶	トーウ	tó	【倒】
	肥	チーヨン	tshoo-ióng	【粗勇】
	婚姻	シエンクー	sing-khu	【身軀】

如此，在本文將這些Ⅱ、Ⅲ的例子視為不使用筆談收集的單字。

另外還有如下之例：

(5)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取る	ギヤーミン	giâ-mn̄gh	【夯物】
	取る	テーツ	thèh	【提】

上兩例日語對譯表示同一個概念，對應的福佬話卻匹配不同的字。於《臺灣》重複的單字有幾個，都是單純的重複，與這個例子不同。不論用打手勢或看狀況，都聽到對方的講話，發生如此出入的起因到底為何？若是記錄者是將聽到的單字用片假名寫下來而纂成的話，可設定過程如下：

發話者

發生思考的動機 ⇒ 內言 ⇒ 話語的意思 ⇒ 話語本身「發話」

²³ 此外之用例均省略之。

聽話者→（同時使用五感掌握話語的意思）

類推 ⇒類推話語的意思 ⇒類推內言 ⇒類推發生思考的動機

如果說話者和聽話者，以同種語言為第一語言的話，聽話者不需透過以五感感到的狀況，來類推得到發話人的思考，但如果彼此的第一語言不同，便只能透過感知感到的狀況，用自己的尺度來推測，因而在此發生齟齬。

綜觀這些上述的例子，在先行研究中提出的「最初期的台語教材使用媒介語言便是官話或英語，不然以文言文（漢字）筆談來收集單字與短句」這點來看，其實不完全正確。分析《新領地臺灣島》〈風俗及び言語篇〉的內容時，這些例證能讓我們了解用筆談和在語言接觸時類推對方的思考、內言、意義的功能等的樣子。

筆者已將本書獨立名詞為主的例證將以闡述，而其他詞類尚不到十分之一。本書僅僅含指示詞 2 個、形容詞 18 個、動詞 27 個、複合動詞 4 個、其他非名詞詞彙 11 個。這些例子除了後面兩個之外，皆是表示具象概念的詞彙，假如聽不懂該單字，實際上看到動作、情況便可類推。然而這種詞通常會在句子裡出現，但令人懷疑的是幾乎不懂該語言的人，能否聽得出來每一個單字。對這樣的疑惑可如此解釋：若是一般母語話者之間的對話，不精通那個語言的人，要聽取特定的單字後抽出非常困難。所以這些例子可看出，台灣福佬話母語話者向素堂學人（日語母語話者）說出的話語。²⁴這類出現「foreigner talk」的狀況，儘管用「foreigner talk」，但不精通該語言的話，還是不可能聽清楚各個單字。因此，可猜測他聽到的內容並非句子而是一個單字。

筆者假設接近維高斯基的「自己中心的語言」或「內言」直接發出來，便與動作同時發生的，如自言自語一般的語言（レフ・ヴィゴツキー著、柴田義松譯，1962：下 217）。換言之，母語話者與素堂學人的對話，和我們的一般會話不同，會互相用類似自言自語的語言來溝通。因為在同一場面且聽話者是非母語話者，過度傾向賓語主義，甚至有一個謂語構成一句的情形，如此一來，不精通目標語言的人，也能抽出一個單字。但例子不止如此，素人學堂透過上述以外的方法，採錄的詞彙如下：

²⁴ 如果素堂學人聽到母語話者之間的對話，是母語場面（native situation），如果台灣福佬話母語話者向他講話，是接觸場面（contact situation）。一般來說，母語話者和非母語話者之間的語言溝通或多或少有 foreigner talk，但上例的情況是非母語話者幾乎不具目標語言的能力，和在語言教學法論到的接觸場面（contact situation）有一點距離（小林ミナ，1998：35）。

(6)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嫁	ツォーシンニヨン	tsò-sin-niû	【做新娘】
	立腹	ウーキー	ū-khì	【有氣】
	申込	チ° ヤオウオイ	tiàu-uá	【召倚】
	注意	シ° ユーシム	sió-sim	【小心】
	臆病	キヤーツ	kiann	【驚】
	恐怖	キヤー	kiann	【驚】
	正直	ラウシーツ	lāu-sit	【老實】

上面的例子抽象性比較高，而且是無法用筆談的例子，社會概念、情緒、時間等情狀，並不會經過前述的過程而有所囊括。因此，此等用例暫先不做探討。

2.2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內》

2.2.1 台灣福佬話教材對譯與日語教材對譯的關係

市川春樹（2010）分析《案內》裡的日文特色時，發現《案內》具有日文教材之性質。《案內》既然是台灣福佬話教材，對日本人而言，以片假名書寫的台灣福佬話即是課文，而日文則是其對譯。然而市川春樹（2010）同時指出與《案內》相較，在《新日本語言集》甲號²⁵課文部分比較時，福佬話教材和日語教材之間的差別並不明顯。這兩者本質可說是對譯教材，配上的對譯可成課文，再者課文可成對譯。因此上述種種，不僅在於分析目標語言，亦注意到配合之對譯，相當具有有效性。

2.2.2 數詞的問題

在本書數詞形成獨立的篇章，事實上篇幅就佔掉了第一章。²⁶首先舉蘇州號碼（蘇

²⁵ 1896 年 2 月出版，學務部編。針對台灣人學習日語的教材。配上台語福佬話對譯。

²⁶ 本書採取以語意類聚詞彙的方式。從日本辭典歷史而看，類聚詞彙的方式有以下三種：

（1）可溯至中國義書《爾雅》，依據語意分類單字的辭典。日本的《倭名類聚鈔（和名抄）》、《類聚名義抄》等相當之。

（2）可溯至《說文解字》，依據部首排列漢字的漢和辭典。以《篆隸萬象名義》、《新撰字鏡》為首，從中國傳入日本。

（3）可溯至《色葉字類抄》，所謂的國語辭典（日日辭典）。《伊呂波字類抄》、《落葉集》、《塵袋》、各本《節用集》等。這些憑いろは順排列單字，但僅以いろは順的辭典甚是罕見，先依據頭文字排列，再以語意或字數的多寡排列順序。以《節用集》為例，早期多見以語意類聚，到江戶時代末葉多見字數類聚。1895 年，已有刊登現代化的國語大辭典，大槻文彥著《言海》（1886 年，明治 19 年），《言海》以後的國語辭典以五十音排列為標準。

對當時日本人而言，類聚詞彙的方法僅有上述三種。既不能依發音查字，又不得知正確的漢字，只得依靠語

州碼子) 書中曰「臺灣數字」，再介紹基數以及序數，其中對基數的記述特別令人矚目。基數的項目有 1-21 全基數和 25, 30 以上的數字以 10 為單位列舉到 100, 100 以上僅舉千萬億。在此舉 1-10 的例子來分析。

(7)	一	イル	イ	チツ
	二	ジー	ヌン	アル
	三	サヌ	サーン	
	四	スウ	シー	
	五	ゴー		
	六	リヨ	リー	ラツ
	七	チー	チーツ	
	八	パー		
	九	キー	カウ	
	十	シウ	ツアブ	

上述的例子除了 5 和 8 之外的數字，附有各 2 個乃至 3 個字。對於這些字《案内》裡沒有任何說明，僅只是列舉而已。數詞在筆者至今調查的對譯教材中，雖然皆是必定提到的項目，但卻未曾看過並列如此多種字。

甚多台灣福佬話漢字音並存白話音和文言音，其中常用的漢字大多數文白異讀，數詞也是。除了 7 以外，都是文白異讀。這些用法可視為與在日語中的吳音、漢音相近，同時，數詞用語也與和語數字、漢語數字的讀音相近。譬如說，如序數的第一、第二不可能唸「だいいつ」、「だいいじ」，福佬話也用文言音不用白話音。確認以上的事情能夠推測《案内》裡，記述的是白話音和文言音，接下來再來看看本來附有假名加台羅的注音與白文之差異。

意類聚方式查詢。在(1)舉的例子之外，正因為上述的原因，朝鮮司譯院的倭學書《倭語類解》也採取語意類聚方式。

(7) a.	數詞	文言音	白話音	非福佬話
	一	イル it	チツ tsit	イ
	二	ジー jī	ヌン n̄ng 【兩】	アル
	三	※ ²⁷	サーン sann	サヌ
	四	スウ sù	シー sì	
	五	ゴー ngóo 或 gōo		
	六	リヨ liók	ラツ lāk	リー
	七	チーツ tshit		チー
	八			パー
	九	キー kiú	カウ káu	
	十	※ ²⁸	ツアプ tsáp	シウ

附上文白之別看出大體上記錄白話音和文言音。3、10 只有白話音，5 因無聲調符號與平、鼻音之區別，而不能分別文白。在此這文白兩種體系以外還存在另一種音體系。筆者認為確定是官話，但對於當時精通官話者稀少的情況下，官話尚且還能被記錄，則感到不可思議，因此推測這或許是著者加藤由太郎在不經意間聽到，並將之收錄所致。

(7) b.	一	イ yi ¹	二	アル erh ⁴	三	サヌ san ¹
	六	リー liu ⁴	七	チー ch'i ¹	八	パー pa ¹
	十	シウ shih ²				

以上是記錄官話的例子，此中 3 和 8 或許是福佬話文言音，10 或許是シプ的誤植²⁹，或是文言音 [sip]，但以聽寫的傾向來看，3 可以是「サム」，8 可以是「パーツ」，而 10 則是白話音「ツアプ」，若是文言音會是「シプ」，因此可認定該者為官話的例子。提數詞的章，因無假名寫成的日語，研究對譯教材時亦容易錯過，但透過分析福佬話對譯，卻能夠如上述般照見一二。

²⁷ サヌ或許是文音 sam。

²⁸ シウ若是シプ的誤植可擬定為文音 sip。

²⁹ 在《案内》裡的台灣福佬話的記述因尚未曾知的言語而常見誤植筆劃相似的假名「エ、ユ」和「ウ、ワ、フ」或濁點、半濁點的誤謬。只用假名沒有漢字的輔助，亦無標聲調符號，不附補助符號之類，調查自然有界限。因此，為了彌補如此的缺陷須利用同時期刊行的類似教材。

2.2.3 引進日語表記的台灣福佬話漢字

透過調查本書，可知日語漢字表記當中存在與「宛字³⁰」及「熟字訓³¹」這兩種不同的表記。雖然實例不多，但對於分析本書性質，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根據陳恒嘉、洪惟仁(1993)，《案內》的漢字表記方式為「台灣單語旁以平假名註義下以片假名注音」，除非是直接轉用福佬話漢字的例子，其餘都是日語漢字。第八章言語裡所揭的短句，是採用漢字平假名混用文部分，也提示了漢字的部分是日語。

(8) a.	こんにち 今天	キンナンテン	めうにち 明天	ミンテン
	こばな 鼻骨	ピーコツ	てぬぐいのるい 手巾	チウークン
	らしや 哆羅呢	タウルイニー	いこくのさけ 三鞭酒	サーンピンチウ
	ひじき 鹿角菜	ロコツイー	あぶらさし 油器	ユキ
	たこ 鱧魚	チアーンフウー	あわび 鮑魚	パーウフー
b.	せいし 青嘴	チンツイフー	じゅんほふてう 巡捕廳	スウーンボウデヤー

例(8) a 和 b 不能說「宛字」或「熟字訓」，可見這些對應的台灣福佬話漢字表記一致。若將(8) a、b 改成福佬話漢字與台羅，則如以下列舉：

(8) 'a.	【今天】	kin-á-thinn	【明天】	bîn-thinn
	【鼻骨】	phīnn-kut	【手巾】	chhiú-kun
	【哆羅呢】	to-lô-ni	【三鞭酒】	sann-piān-tsiú
	【鹿角菜】	lók-kak-tshài	【油器】	iû-khì
	【鱧魚】	tsiang-hû	【鮑魚】	pau-hû
b.	【青喙魚】	tshinn-tshui-hû	【巡捕廳】	sûn-póo-thiann

³⁰ 日語漢字表記法之一。無視字義，只以訓讀或音讀來表記單字。

³¹ 日語漢字表記法之一。以兩個字以上的漢字，表記日語單字，和「宛字」相反，無視字訓、字音。

由該註腳可知「せいし」是一種類似黑鯛魚的魚，特意採用這種方式的原因是在於重視日語、福佬話之間的溝通，「じゅんぽふてう」也是同樣的道理。(8) a 的例子使用福佬話漢字，實際上也說明了可以讓發話人和聽話人一起看本書，以便幫助雙方的理解。這項情事就是市川春樹(2010)指出的《案內》是具有雙方向性語言教材最好的佐證。

在台灣人未能理解日語的環境之下，著者加藤由太郎要如何蒐集台灣福佬話這未知的語言問題，果真耐人尋味。查看當時的資料後，可推測至 1895 年當時的台灣少許存在理解官話或英語的人士。1895 年 6、7 月為止，清朝或台灣民主國官吏，皆已內渡逃往中國本土或台灣南部，筆者推測加藤由太郎活動的地區幾乎沒有會官話的人才留下。而事實上，雖然在澳底（位於三貂角）登陸的近衛師團擁有官話通譯者，但和當地人溝通確有甚大的困難（篠原正巳，1999：11-18）。這些雖然只是推測而已，但我們能夠從這些狀況和本書內容來建立更確實的假設。

³² 另一條是「^{かけもの}掛物…^{しよが}書畫ノ類^{るい}リアー（掛軸……書畫之類）」。³³疑是【遮】jia。

這 2 組各 2 個單字中，有關青嘴者已說明。相當於「だいこん（おほね）」的台灣福佬話單字是「ダイゲーン」，筆者推測這是「大根」的福佬話漢字音。然而這個單字連在《臺日大辭典》也看不到。日語「大根」其實是台灣福佬話一般所說的「菜[tshài]頭[thâu]」，台灣人恐怕即使看到或聽到《案內》所記錄的「大根 ダイゲーン」，也無法聯想到菜頭，反而會以為是很大的根。而若是用媒介語言蒐集單字，則將不會有如此謬誤。一方面「文字 シヤジ」，若用筆談不能發生這一種謬誤，若用聲音語言時才會導致此一情形。

《臺灣》中亦多看到同樣的例子。如此於蒐集單字的過程不只用筆談，同時直接聽到聲音語言而記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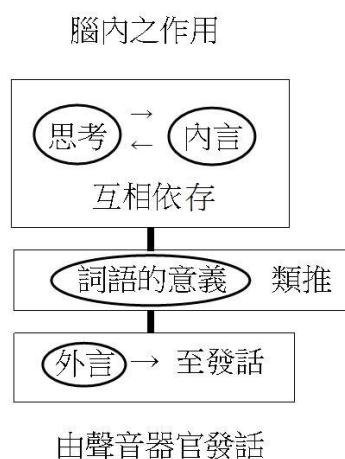
關於「青嘴」如上述般，為了互相了解意圖，可能故意引進福佬話漢字來做表記。然而大根卻無更進一步的說明。這不禁讓人想到，是否因為以漢字作為媒介而進行蒐集單字、短句的一個可能。而大根的錯誤由來，則是在給對方看漢字時引起的單純誤會。另外，青嘴的例子則又正好相反，是在僅聽到「チンツイフー」後導出漢字，然而不懂福佬話的著者不太可能知道漢字，因此，可知此為改寫漢字表意之後，才獲得的結果。而在比《案內》晚一年出版的《臺灣語全集》序文中，也提及了用教材做筆談的可能性：「（此本にて取上たる）土語は一般通用之言語にして談話筆談に於いて最も解し易きものとす」³⁴（（在本書提出的）土語為一般通用的詞且談話、筆談之際最容易了解）。

明治時期日本教養層精通漢文，台灣教養層也是，因此筆談將會相當有效。而因《案內》只用カタカナ（片假名）表記台灣福佬話，用ひらがな（平假名）表記的日語旁邊，漢字僅占一部分，其餘都是日文漢字，因此不禁讓人疑惑，憑藉那些漢字，到底又能做多少程度有用的筆談？從《案內》以聲音作為語言溝通為主要的目的來思考的話，在蒐集單字的階段，有一部分應該是藉由漢字的媒介來進行蒐集的結果，才會發生如例（1）、（9）b 所提的錯誤。總之，至此為止的狀況為證據——台日之知識份子共精通漢文這事實——為用筆談互相溝通的憑證，在此提示用筆談的溝通的證據。然而同時發現否定筆談使用的證據。即是（9）a 之例。以下回顧在確實的記錄中，日本母語話者最初從零開始、不以筆談蒐集單字的例子——金田一京助的樺太蝦夷語調查，再援用維高斯基理論的分析為本項總節。

如此，在本文提出聲音、書寫媒介語言，或者以漢字為主的筆談之外，還有第三種方法的可能性。是以類推獲得內外言，而理解詞意，發展成簡單的對話（問答）的可能

³⁴ 筆者補了（）內詞。

性。舉日本人涉及的例子：明治時代以前，日本人接觸未知語言的例子，有朝鮮語、琉球語、蝦夷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荷蘭語、俄語、英語等不少，其中關於蝦夷語，是由語言學者金田一京助詳述第一次接觸樺太蝦夷人時的情況（金田一京助，1934）。金田一京助進行北海道蝦夷語研究，在前往樺太第一次接觸樺太蝦夷人時，連隻字片語都聽不懂。雖說如此，卻在描繪蝦夷人兒童時，以在旁的兒童所發之一單字為契機，進行採集詞彙的工作，其過程耗時費力，所付出之心力與貢獻著實令人佩服。筆者提到《臺灣》、《案內》二書中並存（1）用筆談之際才出現的錯誤，（2）若用筆談時絕不出現，而在擬定為聲音語言時，才會發生的錯誤。在（2）的過程中，值得注意的，是從發話者腦裡發生思考動機，到聽話者類推發話者的思考動機，再者從發話者的認知，到聽話者認知的過程。但是由於發話者、聽話者的思考、認知是在腦海裡的活動，所以難以客觀的方式來分析。因此，將維高斯基的語言認知模式運用於本文中分析，尚且企圖將不可視的腦海裡的思考、認知的結構可視化，並且分析採集詞彙時，使用類推的認知過程，以及錯誤。總結上述的分析，首先要排除的是先入觀——即認定「筆談」是清晰有效的方式，且在語言溝通上不會帶來任何障礙；而文字之外的方法，包括從身體語言、表情、圖畫、狀況等來類推，是不清晰的方式，且難以讓溝通成立。在第一章介紹了以維高斯基理論為基礎的實驗，現實來講，人們溝通時，除了聲音語言之外，非語言因素也佔有相當大的比重。上述兩種資料總體而言，過半是不會判明是否用筆談的中立的例子，儘管如此，被發現依筆談的確證之例及不依筆談的確證之例，這意義不少。最後還剩了一道課題——腦海裡的思考、認知結構的可視化。本文依據的理論，認為從發話伴隨的思考（的動機）發生到發話本身（外言），聽話者再聽到形成概念，理解語意的一串過程中，人類即使接觸到語意不明白的單字，也有掌握其語意的能力。如下將這些理論和分析畫成一張圖。



圖一 自思考至發話的運作過程

在此分析的「語言」則是專指聲音語言，不使用文字語言。若引據維高斯基理論分析，必須分別聲音語言和書寫語言。在本文中沒特別談論到使用書寫語言（文字語言）時產生的思考、認知結構。首先維高斯基的理論專以聲音語言為其對象，更何況西方的以表音文字為基調的書寫語言和台日兩國的表意文字（漢字）之間可否適用共通的理論，目前為止只是未知數。因此上提的圖可以先不包括書寫語言（文字語言）。

2.2.5 從所記錄的腔調來看加藤由太郎的活動地域

由於當時尚未全島平定，而南部地區的近衛師團，仍持續進行和台灣民主國軍及民眾游擊隊的戰鬥，因此可判斷加藤由太郎蒐集台灣福佬話的地區，是治安較安定且人口較稠密的北部地區，³⁵這點我們在調查《案內》時，已得到了證明。首先舉出整個例子來做說明，再來探討福佬話腔調的相關問題。³⁶

（10）a. 擬定泉州系讀音（以下省略日語注音）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正月	チャーゲーツ	tsiann-gèh	
元日	ドアニンツオイ	tuā-nî-tshue	【大年初】
月	ゲーツ	gèh	
地震	トイタン	tuē-tāng	【地動】
手巾	チュークウン	tshiú-kun	
魚	フー	hû	
生魚	テインフー	tshinn-hû	
鹽魚	キーヤンフー	kiâm-hû	【鹹魚】
乾魚	フーコハンスー	hû-kuann-iû	【魚肝油】
鰻	ユーフー	liû-hû	
鱒魚	チアーンフー	tsiang-hû	
鮭	ケーフー	ke-hû	
錦魚	ギームフー	kím-hû	
青嘴	チンツイフー	tshinn-tshui-hû	
魚油	フーユー	hû-iû	

³⁵ 所收的台灣地名，基隆廳、淡水縣、台北縣、新竹縣、南雅廳等，北部地區比較仔細，在第十章言語內短句也看到「中瀝マヘ行くには如何まいりますか（到中瀝如何去）」。

³⁶ 在《臺灣》以及《案內》表記「魚」讀音時重疊ヒ與フ，表示存在兩種口音，接觸教會的福佬話教材之前，日本人獨自編纂的教材裡面時時看到這種 Ad hoc 的表記。

鮑魚	パーウフー	pau-hû	
鯨魚	ゲヤーフー	king-hû	
澎湖廳	ピイオオデヤー	phînn-ôo-thiann	
右ハ近い	イユーコフーン	iū-kūn	【右近】

b. 擬定漳州系讀音

日語表記	台灣福佬話假名	台羅標音	福佬話漢字
汽車	フーチヤー	hué-tshia	【火車】
ステーション	フーチアタウ	hué-tshia-thâu	【火車頭】
蒸氣船	フーツン	hué-tsûn	【火船】
道具	ケーフウ	ke-hué	【家伙】
火箸	フーチー	hué-tī	
姊妹	ツテユーボウイ	tsí-muē	【姊妹】
妹	シューボウ	sió-muē	【小妹】
銀	ギーン	gîn	
地圖學ノ書	テースー	tē-su	【地書】
魚	ヒー	hî	
鯉	ニキー	lí-hî	【鯉魚】
沙魚	サハヒー	sua-hî	
基隆廳	ゲイローウンデヤー	ke-lâng-thiann	
小雞籠	シユーケイラン	sió-ke-lâng	

隔著台灣海峽而鄰接中國福建省的台灣，北部地區從泉州起始，而南部地區從漳州遷徙來的移民很多，因此口語必然亦不一樣，爾後逐漸隨著時代的遷移、往來的繁盛，形成了「不泉不漳」的，也就是所謂的台語。從《案內》的實例來看，1895年當時的情況已是如此。總體而言，北部腔調優勢，會更加證明加藤由太郎在北部地區活動的事實。於第十章飲食並植物，以及第十四章鳥獸魚蟲看到的魚名並存[hû]和[hî]³⁷，這也呈現了當時的語言現況。如此只以假名文字拼的台灣福佬話文獻，尤其是臺灣語カナ成立以前的資料，因表音不正確而資料價值不算高，但還是為掌握日本統治最初期的語言狀況，提供貴重的資訊。此外，《案內》的日語漢字採取總拼音方式，亦具有明治時期東京方言資料價值。

³⁷ 在第2章分析的《臺灣》看到上下重疊フ與ヒ來表示並存兩種口音。

2.3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中的台灣福佬話與日本語之關聯

分析這類語言教材時，最不可欠缺的是同時分析對譯，事實上市川春樹（2010）〈台灣統治最初期の語学教材『臺灣語學案内』の対訳教材としての特徴〉一文以日語相關的部分為中心，而本文在台灣福佬話的分析對譯中，得到相當大的成果者，便是 2.2.3 探討關於漢字表記的問題，同 2.2.2 藉由數詞分析，得以窺看當地語言的狀況。是故，本文從調查台灣福佬話的範圍，也提供能夠解決日語相關問題的可能性，因此在以下的分析中，將一一點明：

（1）若干有將台灣福佬話的漢字用於日語漢字的表記，那些表記試圖幫助兩語言使用者之間的溝通。

（2）收集單字、短句之際，筆談活用得相當有效，但不是所有的詞都是使用筆談收集的。

（3）《案内》裡的台灣福佬話語音以北部腔為主，更印證了加藤由太郎在台灣北部為了與該地區人士溝通編纂本書籍之事。

這些論點可了解在日治時期最初期日語、台灣福佬話兩語言話者如何溝通，同時和一般的語言接觸不同，因這兩者之間有共通的文字，溝通委實不比想像中困難。另外於《案内》中的福佬話表記，開頭先在「例言」說：「一 此書携帯ニ便ナランヲ欲シ唯々日用ノ最モ要用ナル語ヲ舉ケ務メテ簡略ニ從フ 而メ臺灣語ハ總テ日本語ノ下ニ片假名ヲ以テ初學者ノ爲ニ土語ヲ示ス而已」（此書以便攜帶，唯舉最重要的常用詞，盡可能簡明扼要。而（在此之）台灣語為了初學者，總以片假名提示土語而已），只用カタカナ（片假名）表記。跟同時期的台灣福佬話教材大部分採用福佬話漢文比較時，使人詫異，因此筆者在 2.2.4 指出以聲音語言的溝通為主要目的。然而皆無音節單位的分開書寫，而且不附聲調符號，導致因不能掌握音韻，只好直接轉而書寫聲音，而使謬誤的部分不少，故而令人懷疑實際上本書是否有用？但因日文的記述較為完整，筆者推測應是用於日語教科書の場合較多。又因加藤由太郎不是語言、教育專家，而且也沒有台灣福佬話的知識，因此本書可說已是其極限。

3. 結論

本文通篇探討了《新領地臺灣島》中〈日用臺灣土語〉一節，與《大日本新領地臺

灣語學案內》等相關著述，所收錄的台灣福佬話蒐集方法及特色，和同時期在日本發行的台灣福佬話教材明顯不同，其存在著不使用媒介語言的部分，同時，其並用筆談與類推的方式進行編纂，可說是福佬話與日語的初始接觸中，價值甚高的資料。而市川春樹（2010）已指出《案內》作為日語教材之特色、性質，可藉由對譯俯瞰其雙向性。

維高斯基主張人類的高次元精神活動，起源在社會活動裡，這形成他主張的核心。再者，語言是人為了和人之間溝通而存在，同時也是思考的工具。隨著辭彙的增加，語言的溝通能力也隨之提升，同時於內面識別萬象萬物的能力，也會提升。基於維高斯基理論，對外的語言定義為「外言」，在腦海裡用於思考的工具，便用於自言自語的語言定義成「內言」。維高斯基又主張幼兒因內言與外言尚未分化，而腦海裡的思考，與內言常會伴隨聲音，不知不覺漏出自言自語。

依據該理論，具有不同的社會背景、語言的成人們，互相以聲音語言溝通之時，因無法理解對方思考什麼，社會和思考的關係，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內言」來處理且與思考相互作用，因此引起如第二章看到之謬誤。若不使用筆談，而去理解幾乎未知的語言，則意味著必須掌握對方的「內言」及「發生思考的動機」，方能延伸到思考本身。透過《臺灣》、《案內》的分析，筆者遂提出如上述辯證之過程。

本論述聚焦著重於至今鮮見的日治最初期語言教材，由於是同時檢討對譯日語，所以只用片假名的台灣福佬話分析，才得以順利進行。由這種教材中，可暗示台日兩種語言的使用者，在互相理解對方語言後，再行使用對譯教材，而方能達到學習彼此語言的目標。另外，本文從教材的日語對譯中，亦得到非常有助益的資訊，令人再次深切地感受到對譯的重要性。由於脫離本文的論點，這次在文中並未探討短句及福佬話表記法的特色³⁸，亦不含分析對象的短句、表記法部分，實因這些問題亦該深入探討，故而亦將作為今後的目標，待研究之。

³⁸ 為了表記伴隨聲調且比日語發音部位更狹窄的清齒齶擦音[s]時，スセーカイ（世界）、シスゾオツ（土族）、シサン（頰）、スサツモン（石鹼）等，會重疊サ行音，另外チツテトメ右上邊附上半濁點表記包含[t][n]的音節，而日文中不存在的送氣音以塗黑的半濁點來表記。

引用書目

一、中文書目

- 吳守禮，1955，《近五十年來台語研究之總成績》，台北：大立。
- 陳恒嘉、洪惟仁，1993，〈日治時代台語著作目錄〉，收錄於小川尙義原編，《日臺大辭典》（洪惟仁主編，《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5-6冊），台北：武陵。（原《日臺大辭典》出版於東京：臺灣總督府民政部總務局學務課）
- 黃幸素，2007，〈伊澤修二與小川尙義的言語觀——從日語教育的觀點論述〉，發表於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臺灣語文學系承辦之「台灣語言學一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9月8-9日。
- 賴欣宜，2010，〈日治時期臺灣語教科書之研究——以《臺灣語教科書》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二、日文書目

- 天野馨（寒英）編，1895，《地理風俗臺灣事情》，東京：大川屋[其他]；共同刊行：山口屋。
- 市川春樹，2010，〈台灣統治最初期の語学教材『臺灣語學案内』の対訳教材としての特徴〉，《國學院大學日本語教育研究》，第1号，頁24-42。
- 岩永六一，1895，《臺灣言語集》，大阪：中村鍾美堂。
- 岩永六一著、後藤常太郎編，1895，《臺灣地誌畧・臺灣言語集》，大阪：中村鍾美堂。（增補版）
- 加藤由太郎，1895，《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東京：東洋堂書店。
- 柯德三，2005，《母国は日本、祖国は台湾—或る日本語族台湾人の告白—》，東京：櫻の花出版。
- 木原千楯，1896，《臺灣語全集：獨習自在》，大阪：松村九兵衛。
- 金田一京助，1934，《北の人》，東京：梓書房。
- 小林ミナ，1998，《よくわかる教授法》，東京：株式会社アルク。
- 坂井釵五郎，1895，《臺灣會話編》東京：嵩山房。
- 佐野直記，1895，《臺灣土語》，熊本：中西虎彦。
- 篠原正巳，1993，《日本漢字音との近似性：台湾語雜考》，東京：海風書店。

篠原正巳，1999，《日本人と台灣語：続台灣語雜考》，東京：海風書店。

素堂學人著、瀧川三代太郎編，1895，《新領地臺灣島》，東京：今古堂。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1895，《日本語教授書》，台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1896，《新日本語言集》甲號，台北：臺灣總督府民政局學務部。

田内八百久萬，1895，《臺灣語》，大阪：太田組事務所。

富田哲，1998，〈日本統治開始直後の台灣での「台灣語」研究〉，《世界社会言語学会会報「不老町だより」》，第3号，頁10-19。

樋口靖，2012，〈領台初期の台灣語教学（一）〉，《文教大学文学部紀要》，第25卷第2号，頁23-40。

俣野保和，1895，《臺灣語集》，東京：民友社。（封面書名：臺灣日用土語集）

林美秀，2009，《日本統治時代における台灣語仮名表記の變化過程》，東京：富士ゼロックス小林節太郎基金。

レフ・ヴィゴツキー（Лев Семенович Выготский）著、柴田義松譯，1962，《思考と言語》（Мышление и речь），上下卷，東京：明治図書。

A Study of Editing Teaching Materials of Taiwanese Hō-ló-uē under Early Japanese Ruled Period: Concerning Japanese 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to Hō-ló-uē

Ichikawa Haruki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Treaty of Magun*, the Empire of China ceded the territory of Taiwan to Japan in April 1895. Since the Japanese translators who landed on the Pescadores and Taiwan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the locals in Mandarin, they started to publish teaching materials for translation between Japanese and Hō-ló-uē, such as “日用臺灣土語” of *新領地臺灣島*, *臺灣日用土語集(臺灣語集)*, *臺灣言語集*,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 *臺灣會話編*, *臺灣土語*, and *臺灣語*.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describe how Japanese people learned Hō-ló-uē when they contacted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This topic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although prior studies had indicated that Japanese people collected phrases and short sentences by adopting Chinese characters as a media language or in the lingua franca. However, this paper points out some textbook examples and evidences inconsistent with the assumptions above. For example, there are some entries which were not collected by means of media language in materials such as *大日本新領地臺灣語學案内* and “日用臺灣土語” of *新領地臺灣島*.

Therefore, this paper applies Vygotsky's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al theory, which argues humans acquire languages through a sequence of stages, in short, a process from “external speech” to “inner speech”, and from “inner speech” to their thinking. Although it is a viewpoint about the process of first language acquisition, it can also be applied to situations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under different cultures. It is especially helpful when analyzing wrong usages in the translation textbooks published in the very beginning. Focusing on the way Japanese people collected phrases for translation textbooks, the Katakana transcription

they adopted, and the backgrounds of the authors, as well as a review of prior studies, this paper is anticipated to figure out Japanese cognitions to Hō-ló-uē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ruled period.

Keywords: teaching materials of Taiwanese, Taiwa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aiwanese Kana-transcription, Taiwanese Hō-ló-uē, cognition